

高等教育与社会资本引论

○ 王建华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社会资本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 研究范围十分广泛, 其中偶尔也有涉及到教育的命题。但是将社会资本与高等教育放在一起进行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事实上, 相比与普通教育, 高等教育与社会资本之间存有更为广泛的联系。一方面高等教育可以通过生产社会资本, 促进社会的发展与人的阶层流动,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社会资本的发达程度也会影响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 高等教育;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372(2003)04-0094-04

The Introduc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WANG Jian-hua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Recently, social capital is becoming a hot problem, many researches have been made on, Among which involve in educational problems once in a while, but few people who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fact, there are more relevance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than general education. On one hand higher education can produce social capital, on the other hand social capital can influenc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capital

关于高等教育的属性, 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近年来, 随着社会的转型, 尤其是第三部门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 人们开始对高等教育进行重新定位, 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既不属于政治领域, 也不属于经济领域, 而是属于两者之间的社会领域。在此定位的基础上, 高等教育不但具有政治、经济功能, 生产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而且还生产社会资本, 并借以促进人的阶层流动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何谓社会资本

原初意义上, 资本是一种可见的、物化的东西, 通常指物质资本或金融资本。20世纪60年代, T·W·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 认为教育可以通过生产人力资本,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随着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与广泛运用, 资本的含义得到了拓展, 逐渐成为一切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

词。在此基础上, 资本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开始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许多学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与之相应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概念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1980年,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 所谓社会资本是指, 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在布迪厄之后, 还有许多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过不同界定。这些学者中, 詹姆斯·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和分析比较中肯。在科尔曼看来, 社会资本不是一个单一体的, 而是有许多种, 彼此间有两个共同之处: 其一, 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 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 其二, 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 它的存在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 与之相应, 在缺少它的时候, 这些目的就不会或很难实现。其他关于社会资本的界说还有很多。比如, 罗纳德·伯特认为,

[收稿日期] 2003-09-01

[作者简介] 王建华(1977-): 男, 河南息县人,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

社会资本是指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格林·洛利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促进或帮助获得市场中有价值的技能或特点的人之间自然产生的社会关系。罗伯特·D·普特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而亚历山德罗·波茨则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于网络或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由此可见,不同研究者对何谓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界定,但彼此之间差别不大。归纳起来,可以认为,社会资本是指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一方面,这种关系是彼此信任的中介体,通过它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社会成员的互惠互利,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以“关系”的形式存在,不只是属于某一个人,这也就意味着社会资本属于公共物品,不会因为使用而枯竭;与此同时也说明,社会资本无法由私营部门提供,只能通过社会团体成员的相互作用而不断积累。

就目前而言,社会资本已成为一个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并列的资本类型,并开始以无形资产的名义进行交易。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本身的多学科性,它可以为许多学科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其结果社会资本迅速成为学术界的时髦用语,以至于“在社会资本身上,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决策者——及各个领域内的种种阵营——又一次开始发现了存在于彼此公开的、建设性的争论中的一种共同语言,一种在过去的150年受到狭隘的学科主义严重压制的语言。”^{[1](P300)} 具体来说,目前各个学科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七个领域,即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家庭和青年行为问题、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共同体生活、工作和组织、民主和政府治理、集体行为的普遍性案例。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视角对社会资本或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进行的研究较少,仅有詹姆斯·科尔曼和托马斯·霍弗的《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社群的冲击》以及M·史密斯等人的《社会资本、居住地和参加团体》等。故此,本文的研究只有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切入,对高等教育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做出尝试性的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

二、高等教育生产社会资本

高等教育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功能各不相同,但抽象而言,高等教育的目的却只有一个,即生产与传播知识。不过,不同时期知识的目的与属性各不相同,这也就决定了不同时期高等教育所生产的“产品”亦不相同。如克拉克·克尔所言,“知识原先是为了真理起见(例如亚里士多德),然后是为了对自然的权力(例如培根),然后为了国家的领导(例如拿破仑和洪堡),然后也为了个人的能力(例如杰弗逊),然后为了领导的素质(例如纽曼),然后为了金钱(例如富兰克林和马奇卢普和一切工业社会),现在为了所有这六项(和其他目的)一起。”^{[2](P73)} 由此可见,当今社会,高等教育不但生产人力资本(培养人才),还要生产物质资本(科研成果)。不过,笔者以为,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比,高等教育对社会资本的生产也同样重样。

由社会资本的定義可知,社会资本主要指建立在信任、规范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参照这一定义,我们来看一下高等教育是如何生产社会资本的。“除了或明或暗地教给非人格化的信任、同情和互惠之外,现代学校还开始有意识地教授与他人合作的艺术。它们谨慎地引进集体学习课程,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团队游戏、学校比赛、学校乐队和多种共同活动上。沃伯等人(1995)证实,参与学校活动对成年后的政治的和共同体事务具有重要作用。不过,教育的主要效果也许并不是关于在群体中行动的体验,甚至不是理解诸如公民、普遍主义、平等、共同利益、合作的益处等抽象观念以及和平的冲突解决之道中难以言传的微妙之处的能力。正因为如此,在最后几年的全日制学习——大学或学院教育——中,教育对于社会资本的效应非常明显。这可能是在最后几年的教育中,人们学习到最多的是怎样不但与那些本人认识的人打交道,而且与那些本人从未见过,但不管怎样被认为是同一个一般性共同体的成员的人打交道。”^{[13](P406)}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对社会资本的生产随处可见,我们现在常提到的校友会、同学会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正如刘持金先生在一次报告中所提到的那样,哈佛商学院世界有名,商学院的许多毕业生成就辉煌,但这并不能完全归功于佛商学院的教育质量,即不能仅仅归功于“人力资本”的因素;相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相互支撑的关系网络在毕业生以后的工

作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也即哈佛商学院为他的学生提供的社会资本对他们毕业后的工作也相当重要。

扩展开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高等教育对社会资本的生产还具有内在的普遍性。正如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非常贫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地方的人民之间缺乏相互的信任,即缺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资本。稍微对比经济发达国家与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森的观点不难认同。在经济发达国家,随着教育的普及,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与人之间信用度增高,欺诈行为减少,整个社会呈“胶着状”、良性互动,发展状况良好;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为教育水平极低,人与人之间则缺乏起码的信任,整个社会呈散沙状,使得经济发展的制度执行成本过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归结起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社会资本的发达程度与该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也即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公民教育或道德教育生产社会资本,而通过这种资本可以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如科尔曼所说,“道德行为,按照一个好的准则或者一套‘规范’应该被看作任何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形式,对于它的行动的质量也是必不可少的。”^{[23](P162)}

总之,高等教育对社会资本的生产是普遍的、不容忽视的,社会资本在高等教育的诸多产品中至少具有与人力资本同样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所获得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一起促成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基于高等教育生产社会资本的客观现实,我们在研究高等教育公平、少数民族入学、贫困生资助、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的流动等许多问题中,也惟有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才能使得这些问题得到更加科学而圆满的解释。

三、社会资本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范畴,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目前国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探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在该研究框架内,社会资本也就相当于“文化力”或“文化资本”;其二,研究制度、规范以及网络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这时社会资本相当于传统、风俗、习惯等各种非正式制度;其三,主要关注社会网络关系,这时社会资本比较接近于其原意,即信任、规范、

网络等相互支持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的“公共关系”方面,即一个国家社会资本的发达程度将决定该国高等教育与外部组织及个人的关系和谐与否,以及高等教育是否能够得到政府、公民及其他组织的信任与支持。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高等教育获得捐赠的情况;其二,高校与企业的关系;其三,政府对大学的态度。

其一,高等教育获得捐赠的情况。乐善好施、互惠互利是一个社会是否拥有雄厚社会资本的重要标志。在一个社会资本发达的社会里,第三部门组织十分发达。这些组织以自愿与非营利为宗旨,向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物品,而这些组织的活动经费则通过自愿捐赠来筹集。如此以来,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整个社会显得十分团结与和谐。就高等教育而言,高等学校同样属于第三部门组织,它的发展除了政府的拨款以外,同样需要社会各界的资助。以美国为例,美国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居于世界前列,这其中办学经费充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美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经费除了政府拨款以外,社会各界的捐赠也十分可观。下表是 1997—1998 年度美国高等教育获得捐赠的具体数据:

1997—1998 年度美国高等教育获得捐赠情况

| | 受助总额(单位/亿美元) | 百分比 | 百分比变化 | |
|------|--------------|------|-------|-------|
| | | | 一年 | 五年 |
| 校友 | 55 | 30% | + 18% | + 85% |
| 其他个人 | 45 | 24% | + 17% | + 78% |
| 企业 | 32.5 | 18% | + 7% | + 35% |
| 基金 | 38 | 21% | + 19% | + 73% |
| 宗教组织 | 3 | 2% | + 20% | + 20% |
| 其他组织 | 10.5 | 6% | + 5% | + 25% |
| 总计 | 184 | 100% | + 15% | + 64% |

资料来源:美国教育援助委员会,转引自:《国外高等教育快讯》1999 年第 4 期(总第 80 期)

与美国相比,一些社会资本比较贫乏的国家,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捐赠就少得多,即使有些捐赠其功利性也较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社会资本欠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与社会资本的发达程度呈正相关),投资办学多于捐资办学的原

因。当然,在办学问题上有利益驱动的缘故,即使在美国这样社会资本高度发达的国家,同样存在营利性学校。但是,这里想说明的是,真正一流的私立大学不是靠投资办学形成的,更不可能是营利性的,因为大学的组织本性在于自治与非营利,纵观所有一流的私立大学,哪一个不是从捐赠起家。

其二,高校与企业的关系。近来,新经济非常时髦,而“在新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网络、合伙与合作创业”^{[1](P209)}。这也就意味着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关键因子,也就意味着高校与企业建立多种多样的合作关系将成为必然的选择。在此背景下,社会资本在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也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某种意义上,社会资本就是指,在一个组织网络中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它是高校与企业建立有效合作关系的关键所在。为便于理解,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中西方大学与企业的关系进行简单比较。在西方国家,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存在是一个典型的特征。在公民社会里,公民结社自由,整个社会由无数的团体组成,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的原子化,社会资本丰富。而中国社会,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讲,则是一盘散沙,人与人之间没有结社的传统,事实上也缺乏结社的空间。这就使得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历史的程序上,由于社会资本的发达程度不同,中西方社会只能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观念去进行。就大学与企业合作来讲,西方人以信任为基础,倾向于采取分工合作的思路,认为应将不同的职能交与不同的组织机构,然后进行合作,才可达成最佳效果。而在中国人看来,一体化则是最优的选择。在中国人心中,别人都是不可信的,如果一个机构能做的事,最好由一个机构来做,很少去考虑会不会存在另一个机构更适合做这件事,这个机构做这件事是利大还是弊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资本的贫乏,中国的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占绝对主导(或说,由于政府占主导,社会资本贫乏),我国大学难以形成自己的传统,没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影响力,在与企业以及政府的对话中处于明显的弱势。这种情况的存在就使得大学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时,立场难以坚定,态度不够鲜明。事实上,由于大学传统势力的弱小,中国的大学甚至很难判明哪类活动会影响大学的自治、学术的自由,哪些活动又应是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其三,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社会资本对高等教育的第三个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待高等教育(或说是大学)的态度上。在西方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主线,即政府在处理与大学的关系时,以不“干涉”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原则。二者之间体现的是一种信任,即政府相信,高等教育不会危机政党的统治与政权的维系。即使后来,为了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成立了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组织,其目的也是在协调大学与社会发展目标的同时,保护大学的自治、学术的自由。而在中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则是以政府的控制为主体。所谓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也就是政府对大学控制的程度如何。在我国,长期以来,大学根本没自主权可言,一切都纳入政府计划。政府与大学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就不是一种对等的信任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与之相应,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的建立与西方国家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的建立有着截然不同的旨趣。如果说,西方大学的中介性组织是为了使深居象牙之塔的大学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我国大学中介性组织就是为了使深陷于社会事务之中的大学,能退一步,能远离行政的干预,能以学者的方式解决学术的问题,能更多一点具有象牙塔的气质。当然,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府制度、大学理念等,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进行分析是不够的。但是,不同国家由于社会资本的存量不同,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在社会资本丰富的公民社会里,政府倾向于相信大学;而在一个社会资本贫乏的总体性社会里,政府倾向于怀疑大学。可以预期,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一定是和谐的,而建立在怀疑基础上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一定是别扭的。

[参考文献]

- [1]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2]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任元军]